

云南民族传统音乐 学术阐释与活态推广的有效示范

——《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导论》赏评

申波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价值观的转型。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当下，如何依托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促进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身份的觉醒、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讨论已成为显学。在多民族文化荟萃的云南，如何依托地方性独特的文化资源，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推动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已成为行业努力的目标。如此，打造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并自觉传承民族文化精髓的学术实践，成为文化“新质生产力”提质增效的首要任务。

在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云南，各民族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构成了斑斓的文化长卷，特别是民族歌乐的律动，是各民族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类别丰富的民歌是记录各民族心路历程的古籍、是承载各民族文化精神的历史记忆。学校教育作为民族文化活态推广的重要平台，如何将其鲜活地再现于音乐教学的课堂并延伸至课外的文化体验，既服务于本土音乐学科建设的持续发展、又自树一种有别于他者音乐课程内容设置的教学模式，近日，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为实现云南本土民族音乐文化资源在新时代的活态传承提供了有效的学术示范。

对社会需求的有效回应

《导论》的编写历时8年，上下册共计七百余页的书体体量，折射出编写者的精力投入与智力付出。在浩大的编写过程中，该书系统梳理了云南世居少数民族民歌、器乐、歌舞音乐的脉络，为未来的学习者搭建了田野与课堂的桥梁，更为重要的是，本教材的编写受益于云南大学作为“双一流”大学人文氛围的熏陶，也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民族音乐文化与语言数据集成及共演化研究》学术团队的学术氛围的濡染，使得教材的编写从构思到立项、从提纲到写作的全过程，彰显出立意高、创意新、思路清、方法明的高起点，同时，作为教材的编写者，陈春轩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音乐学）与邱健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学）的倾力合作，更是显现出两位编写者学科优势互补、知识积累互动、田野体验共享“强强联合”的闭环继而达成出版成果的双向观照。

书香云南

地方名药传记的精品

伏自文

2024年10月15日，杨祝庆著述的《昆明名药史话》（云南人民出版社2023年5月版）荣获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省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创作优秀作品一等奖，成为地方名药传记的精品。

杨祝庆是云南大学哲学专业的毕业生，致力于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文献保护。2003年进入中药业，埋头于《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滇南本草》等经典医籍，业余整理身边的中成药历史文献，20年后捧出《昆明名药史话》，把中医药的文化哲学呈现在我们面前。

崭新的学术视野

《昆明名药史话》最显著的学术贡献在于开创了“中成药个体史”记录的新视野。与以往医药史著作侧重通史或理论阐释不同，该书创造性地选取了昆明著名的87首中成药（如六味地黄丸、舒肝散、百宝丹等），为每一首方剂独立立传，“一药一篇，一一叙述每种成药从源到流、演变至今的历史”。这种微观史的整理之法，使读者能够清晰了解每一种中成药完整的生命历程，从创制渊源、配方演变、工艺改良到临床应用，形成整体性的认识。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采用“因药记人、因方记事”的方法，将药物史、人物史、社会史和思想史巧妙融合。在追溯药史中，叙述以兰茂、彭子益等为代表的云南医药学家的突出贡献，以及戴丽三、姚贞白等近代名医的制方智慧。这种写法打破了药史见药不见人的局限，使中医药知识变得有思想、有温度和有故事，真正实现了“寓理于药史”的著述初衷。

严谨的史料运用

《昆明名药史话》的另一大特色是扎实的第一手史料，作者是档案专业的研究馆员，获得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颁发的“全国档案工作人才”荣誉，主办过云南省首个中医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传统制剂方法（昆中药传统中药制剂）”的申报与整理，有档案编纂技术的长期历练，有地方医药文献的专业储备。全书以民国档案《昆明方目》（1939年）为蓝本，“原原本本采录其药名、组成和分量”，既留存了旧时昆明中药业颓危的配本，又追溯其中方剂的来源，并记述了后世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纵横兼顾，本书从尘封的档案中揭秘许多真相，探幽发微，清晰地梳理出以技术为核心的文

要推广者在人文精神的指导下，把云南各民族的音乐文化置于技术理性的引领之下，以创造性的选择与创新性的解读，使之成为适应审美需求的语汇，让云南民歌的符号文法具备自身形态结构的推动力，推动云南民歌的动人情韵“流行”在学习者的口头上、传承在心坎里。基于此，本书作者的学术书写与这样的学术目标基本达成了自治。

如果说，音乐是一种高度结构化、极富标识性的声音形式，那么，作为标志性学术功力的显现，中央音乐学院和云峰教授在本书作序时就写道：“《导论》创新构建了语言谱系、民族化、音乐类型、本土术语四位一体的解析体系，既发现了同源语族在旋律模态、调式特征等方面的共性规律，又揭示了不同语系在音乐表达中的创造性差异。这种双向研究，既证实了语言对音乐的本体制约与建构功能，又通过音乐元素的跨语族交融，展现了云南多民族音乐文化共享的文明密码。”同样，北京大学的陈保亚教授在其序言中也写道：“正因为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导论》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少数民族音乐多样性的窗口，同时也为研究音乐范式和音乐交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作为一种对编写者学术功力的认可，陈教授还写道：“《导论》正是从语言谱系的角度出发，探究了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特征，通过语言的多样性来认识民族音乐的多样性，这种方法具有创新性，有助于理解语言与音乐共生的演化机制。”

学术的功力是彰显潇洒的底气。上述专家认同学术功力的多层次点评，使《导论》超越了以往同类成果“学术书写”与“教材编撰”边界隔离的壁垒，为突破传统教材的写作由“知识传递”向“知识创新”的度越提供了文本示范，更在学术话语的表达上形成了极强的辨识度。

为民族音乐的活化提供动能

结合《导论》的出版再考察业内音乐教育的现状，其出版目标无论从理论期待再到现实需求，均彰显出编撰者学术思路的综合考量与职业操守，这可从编写者开篇所袒露的话语中探察到这样的学理镜像：“著述的目标是尽可能地为读者呈现一幅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三维地图’。第一个维度是总体性筹划，以语言谱系划分为参照进行民族分类并设置单元结构；第二个维度和第三个维度是平行关系，即

以民族文化特性为脉络进行整体编排，以传统音乐体裁为主线进行系统整理。”恰恰是这样的学术锚位，与国家《音乐课程标准》所倡导“理解音乐音响的存在，实际上是理解文化中音响产品及过程的总体组织”的核心精神达成了学术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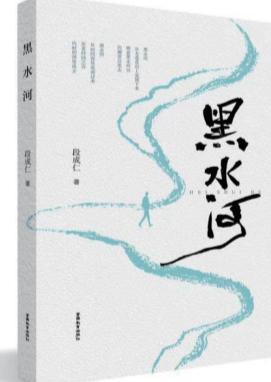
《导论》的编写，其核心内容犹如传统文化传承的源头活水，顺应了后现代教育学学和内涵所倡导的“尊重文化个性、强调文化差异、重视主体精神和创造性学术发挥”的宗旨，而教材内容“本土定位”，将与近年来从国外引进的各式“洋教学法”构成殊途同归的教育哲学意义。正如云峰教授针对教材出版的意义所指出的那样：教材编撰“专业化的理论体系，既为非遗活态传承提供了学理支撑，也构建了‘民族音乐进校园’的范式样本，为民族音乐的教育传播与保护实践提供了可操作的学术蓝本，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学科建设的价值共振。”的确如此，音乐价值观的核心取决于文化价值观的定位，因此，大千世界，艺术的多样性并存与教学内容的多样性并举，才是现代音乐教育发展的必然之路。

21世纪，人类最关心的话题，一个是全球化发展、另一个是文化与生态的多样性。国际著名的未来学者奈斯比早就说过：“由于外部世界的日益雷同化，我们将更加珍视从内部萌发出来的文化传统。”当下，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在强调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尤其强调关注边缘文化群体与次边缘群体的文化。因此，民族文化最为丰富的云南，无数事实证明，在社会的发展中，若是丧失了文化传统，就意味着丧失了竞争的砝码，反之，则将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如何实现“教育生态多样性”这一叙事目标，或许永远没有确切的答案、永远不会到达顶点，但如何将音乐教育的单一教学模式向多样态教学内容的过渡，用教学的体验促进科研的思考、以科研的成果推动民族文化强省的学术攻坚，陈春轩与邱健二位学人在《导论》中所开展的学术尝试，无疑为业内的学术实践提供了启发性的样本。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合办
邮 箱：ynwypl@126.com

新书架

《黑水河》 出版发行



段成仁散文集《黑水河》近期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收录了16篇作者近20年创作的散文作品，这些作品以作者出生地黑水河谷为叙事原点，融自然人文、生命体验与乡间众生于一体，既是作者人生的离乡史，亦是精神的返乡史。其文字炽烈克制、深情审慎，以个体叙事承载时代重量，在地域印迹与情感共鸣中，叩问生命本质与人性复杂，兼具文学审美与社会文化价值，是一部镌刻着乡愁与哲思的隽永之作。

段成仁，业余以码字为乐，散文作品见于《天涯》《清明》《芒种》《散文百家》《边疆文学》等期刊。

黄立康



云岭阅读

穿越古今“共云山”

——杨不寒新诗集《窈窕之章》读札

何飞龙



自新诗诞生以来，向西方诗歌学习一直是现代汉语新诗艺术探索的重要路径。然而，使现代汉语新诗保持“汉语的”民族特性，则关涉诗人如何有效地“继承”中国古典诗学资源。诗人杨不寒的诗歌创作，体现出显著的现代生命经验与历史文化有机融合的自觉意识。在他

的诗歌创作中，大量充满古朴气息的古意象扑面而来。杨不寒的写作如同驾驶一艘夜航船，在墨色的海洋上与那些闪烁于人类文明史的历史人物相遇，抚摸彼此的心灵。

杨不寒致力于激活古典，从而探寻其当代表达的可能性。故而在杨不寒的诗作中，可以看到既隐身又现身的自我形象。在他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抒写对象的作品中，常表现出对“题材”实践功能的超越，从而构建起一种独特的认识历史的诗歌视角。这种对历史的透视与回望，是一种非线性的叙述，而是将历史文化记忆与当下生命经验进行有机整合，是一场回归古典的审美之旅。在长诗《窈窕之章》中，杨不寒将“巫山神女”的典故巧妙地移植在当代女性身上，在解构古典诗歌意象的过程中洞察当代女性的生命困境。诗中的“她”看似被冠以“现代神女”的称号，其命运却

是被水草缠绕周身。在“她”努力“扯断周身水草”的抗争中，却遭受来自生活的重重围堵，便对象征永恒的“石化女神”萌生质疑：“她越来越怀疑所谓‘她’只是一堆虚构的石头，所以自己得不到真实的安慰/庇护”。在这首艺术性与思想性俱佳的长诗中，通过对古典意象的现代性转述，杨不寒对以诗中“她”为代表的现代女性生存困境进行呈现：即“在虚空中飞升”的同时“在掉色的倒影里/不断沉下去”。

杨不寒对古典诗歌传统有着深入理解，在继承古典的同时进行自我内化，赋予其全新的现代性内涵。因此，在《北碚》，萧红的1939年寓居重庆北碚的才女萧红，在相向而开的窗户前完成了穿越时空的“相认”：“隔着时间的江水，她的窗户/与我相向而开，仿佛在等着我/前来相认。”杨不寒常常以现代意识解构历史并对其进行想象性的重构，致使诗中的说话人“我”既成为历史的旁观者又成为参与者：“我在试管外，屏吸观察他/与楚南空气发生化学反应的过程”（《芰荷为衣·六》）。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的叙述中，三闾大夫屈原被冠以忠君爱国、品性高洁等标签，这固然体现了屈子的伟大人格。然而，杨不寒则对历史进行还原并指认出一个真相：“诗人就是古老傩戏里的‘一张悲剧脸谱’”（《芰荷为衣·九》）。此外，陶渊明、嵇康、杜甫、苏轼等历史人物及其文化灵魂，在杨不寒的笔下均被重新激活，获得了当代意义。

黑格尔在《美学》中曾说过：“诗人必须从内心和外表两方面去认识人类生活，把广阔的世界及其纷繁万象吸引到他的自我里去，对它们起同情共鸣，深入体验，使它们深刻化和明朗化。”从杨不寒的诗作内容来看，他不断地将当下自我的心灵方寸与历史人物的精神内蕴进行对接。然而，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摆在读者面前：作为生活在现代的人如何穿越时空与古人进行一场灵魂的抚摸，如何延续古典诗歌的精神血脉？《共云山》一诗，或许给出了答案：

“共云山”

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一》

大历元年的日影下，月色下

老杜甫与五溪人一同作息
在我的峡江故家。两岸山岩陡如楼台
猿猴用手掌，给石灰岩的卵榫抛光

离开瞿塘以后，我搬进了

北碚的高楼。一夜一夜幻想
幻想钢筋拱起的建筑

也似崖岸，时间的光影在马路上流淌

昨天下午，我走进社区超市

突然记起老杜甫也时常散步到楼下
沽酒，买鱼。于是对水产区

那个面带愠怒的老人，多了几缕敬意

凌晨，我梦见他在诗里放养的水云

已随我来到人世间

同我一起在大街上走动

也一起巢居，城市的危崖上面

《咏怀古迹五首》是杜甫于“大历元年”（776年）在夔州（今重庆奉节）所写。千年后，来自重庆奉节的杨不寒以《咏怀古迹·其一》中的名句“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为引，在一种互文性写作中建构起别致的对话空间。诗作开篇用具体的时间“大历元年”和空间“日影下”“月色下”为历史赋形，将抽象的

历史事件还原为一个具体的时空。杜甫也不再是一个“现实主义”爱国诗人的干瘪符号，而是与五溪人“共云山”立体的形象。然而，诗人并未滞于对历史的外在描述，而是用一句“在我峡谷故家”将古典与现代的界限消弭，让“我”与杜甫同处于一个交错的诗意空间。“猿猴”用手掌对陡峭如楼台的两岸山岩的卯榫抛光，则将自然景观进行入化，与第二节中的都市建筑形成呼应。

在第二节中，一个关于离乡寓居他处的生命课题被诗人抛出。当“我”的生活空间从“瞿塘”变成“北碚的高楼”后，生命经验与生活体验均已发生转变。“钢筋拱起的建筑/也似崖岸”与第一节中陡如楼台的山岩形成诗意的圆环，寓居夔州的杜甫与身处北碚的杨不寒所面临的去乡后的生命感知再次产生共振。这种空间上的转变，带来了对时间敏锐的感悟：“时间的光影在马路上流淌”。诗人试图在时间的流动性中寻求与彼时杜甫精神意蕴上的共通性，也即“共云山”。概言之，身处异乡的杜甫在进行自我调适后寻获“五溪衣服共云山”，离开瞿塘进入都市生活的杨不寒也在寻求“北碚高楼共云山”。

诗歌的第三节将“我”与杜甫的生活经验的对撞推向更深层。杨不寒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庸常生活的新视角，即在重复琐碎的生活中发现诗意。社区超市在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常购物似乎彰显出某种反诗性。然而，逛超市这种带有重复性的行为，在诗人“突然记起老杜甫也时常散步到山下沽酒，买鱼”后，具有了诗性的可能性。杨不寒将杜甫从文学史的圣坛拉回人间，他与当代一个普通的城市居民一样，需要纠缠于油盐酱醋。这种以生活为诗的态度，使“我”对水产区“那个面带愠怒的老人，多了几缕敬意”。在重复且单调的购物中，潜藏在生活细节中的诗意被发现、激活，“我”与同样需要“沽酒，买鱼”的杜甫实现了一场跨时空的精神共鸣。

诗歌的结尾处，诗人以梦境将现实与超现实联结起来。杜甫在“诗里放养的水云/已随我来到人世间”，意味着诗人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找到了可以承续的精神内核“水云”，这是一种具有流动性的自然现象。源自杜甫的“水云”在当下“同我一起在大街上走动”并最终与“我”一起巢居于，城市的危崖上面”。巢居”昭示着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的生命状态，宛若鸟一样。尽管城市化给人们带来诸多的便利，然而这种失乡后游魂般的命运遭际，则如同居住在“城市的危崖上面”一样危险。

整体看来，《共云山》一诗的内核在于“共”，诗中“危崖”一词出现两次，这表明杨不寒在诗作主题“共云山”之外，还对当下人们面临着的撕裂和矛盾生命境况进行了思索。在“共危崖”与“共云山”反向角力中，杨不寒提供了一种可供读者参考的审美路径。其一，杨不寒试图在现代都市生活的褶皱中，寻求诗意图居的可能性，以实现日常生活与诗意图居之“共”；其二，钢筋水泥丛林不应是充满灵性自然的对立面，在都市生活中打捞诗意图谋求他乡与故乡的空间之“共”；最后，生活在“诗意匮乏”的加速社会，那些历史中熠熠生辉的生命体或许能在一颗虔诚的诗心叩问下，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观照。

黑格尔在论述历史与诗的差别时认为，诗具有一种改造现成材料的自由，从而“使外在事物符合内在的真理”，这意味着，诗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叙述，通常是带着强烈主观意识的想象性重构，而非史学如其本然那般陈述客观的事实。杨不寒有着自觉的诗歌艺术追求，有意识地建构一座跨古今的桥梁，将古典与现代、历史与当下、个体生命经验与历史文化记忆联结起来，最终完成一次诗歌艺术的审美旅行。

